



上海宗教界积极行动,成为抗日救亡重要社会力量—— 僧侣救治伤兵 教堂收容难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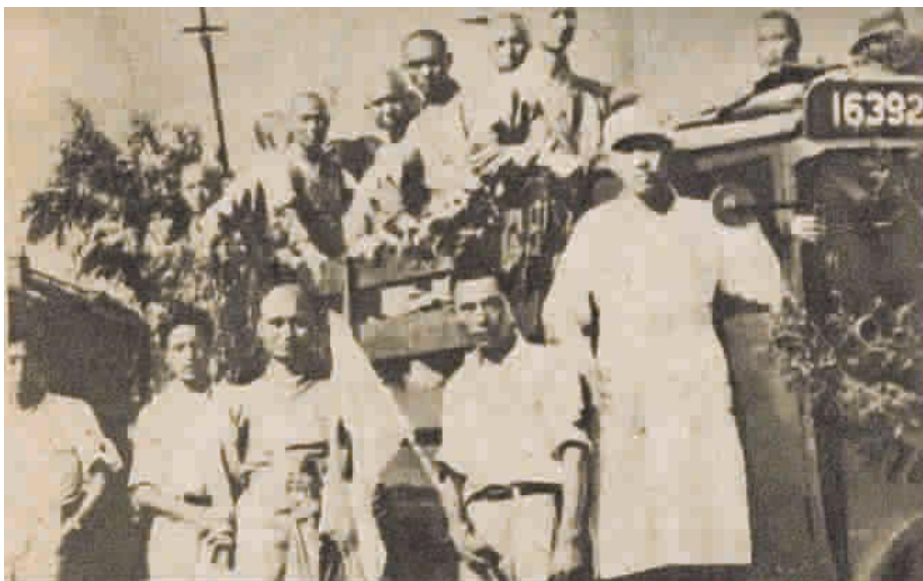
上世纪30年代,伴随城市开放与发展,各大宗教在沪日益兴盛,上海跃升为我国宗教界的中心。抗战爆发后,宗教界人士在国难当前、民族危急时刻,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发表告教徒宣言、设立难民收容所、组织救护医疗队,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发表宣言 号召救国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佛教会主席圆瑛法师眼见祖国山河破碎,即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发表《为日本侵略致彼国佛教界书》,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占据中国领土,残杀中国人民”,并写下了著名对联:“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圆瑛法师在沪召开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

上海还活跃着一群爱国的基督教人士。“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时,刘湛恩、颜福庆等28人联名发表《上海各界基督徒对时局宣言》:“我们爱和平,但我们更爱公道;我们不想作无谓的牺牲,但我们也不惜为真理与正义而流血,我们决定尽我们的力量,去做这个伟大的反抗运动的后盾!”淞沪会战打响后,沪上基督教团体立刻发表《告全国基督徒》宣言,要求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此外,《申报》《大公报》《救亡日报》等都刊登宗教界人士撰写的抗日救亡文章,《新华日报》还



■ 抗战爆发后,圆瑛法师组织的上海僧侣救护队开赴前线
资料图片

为伊斯兰教界设置专栏,发表《日寇对同胞之暴行》《告沦陷区中的回民》等文,激励广大伊斯兰教徒:“为我整个中华民族,为争取中国与全世界的永久和平,去和人类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拼命!把侵略我们的强盗赶出中国去。”

救护伤兵 救济难民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佛教会立即成立灾区救护团,200多名青年僧徒在上海玉佛寺报到集训,奔赴前线支援中国守军。出发前,圆瑛法师对救护队说道:“每一名队员都要以大无畏、大无我、

大慈悲的精神,做好配合抗战的救护工作!”在淞沪战役中,上海僧侣救护队共救治伤兵和难民8273人,被誉为“英勇僧侣”。

除组织救护队外,宗教界还设立伤兵医院、伤兵俱乐部。“八一三”后的第二天,虽然时值暑假,天主教震旦大学的师生还是闻讯赶回学校,将医学院大礼堂改为临时医院,教授及医学生为伤员包扎伤口、取出子弹或手术截肢,其他学生则承担担架运输、维持秩序等辅助工作,震旦大学共收容伤员1400人。

1937年8月,闸北、虹口一

带毁于炮火,大批难民涌向市中心露宿街头。各宗教团体发扬慈悲博爱精神,上海佛教界成立“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先后设立50多个收容所,救济难民50万人次;基督教人士或是腾出教堂空屋成立收容所,或是举行义卖向工商界劝募捐赠难民;穆斯林也建立回教难民所,筹募粮食、衣服及生活用品,并在伊斯兰教上层推销救国公债,帮助难民生产自救。

传播真相 呼吁支持

宗教具有国际性,上海宗教界

人士也利用这一特点,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关注和支持。

其中,伊斯兰教界人士的表现尤为突出。上海伊斯兰教教长达浦生利用参加埃及王子结婚盛典、中东各国元首云集的机会呼号:“我整个中华民族上下一致,威存玉碎之心,不为瓦全。”他特别强调,中国回教徒也一样热爱祖国,抗拒暴政,不愿为日寇之奴隶。埃及国王当即表示支持中国抗战。在世界伊斯兰教大会上,达浦生又向15万与会者控诉日军侵华罪行,并花3个月时间用阿拉伯文写出《告全世界回教同胞书》,印发给伊斯兰教国家。

上海基督教团体也向国际社会发声。1937年8月,陈文渊、江长川等20人联名用英文发表《为中日战争告普世基督徒书》,呼吁国际友人支持中国抗战。1938年圣诞节,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发动学生写了1500多封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呼吁制裁日寇侵略维护和平。趁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在荷兰召开之际,他们将照片汇编成2000本图册,分送各国代表。这些举措引起国际基督教界对我国抗战的同情,美国成立了援助远东学生捐款委员会,至1938年募集2万美元汇至中国。

宗教界的宣传,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也激励华侨支援祖国,对赢得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国际环境起到积极作用。

本报记者 范洁

东方图书馆:文化圣殿被疯狂摧毁

寻访上海二战遗迹

对一个国家而言,文化的毁灭就像人被刺中心脏一样致命、一样难以挽回。在淞沪变事的次日,日寇便将炮火倾泻在东方图书馆——这座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图书馆上。斗转星移,昔日恢宏的东方图书馆如今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一块纪念碑警示着人们不要忘记那段惨痛的历史。

东方图书馆遗址位于今天的宝山路584号上海市市北职业高级中学内。校舍环抱中的绿地上竖立着一块“上海文物纪念地”石碑,1927年,东方图书馆曾经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

但如今校园内的学生和经过的路人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是一处文化圣殿旧址,是一个不能忘却的纪念。

藏书曾居全国之最

东方图书馆创办人张元济的孙子张人凤老先生告诉记者,著名实业家、藏书家张元济先生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后,“求



■ 东方图书馆旧貌

资料图片

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以“开启民智、扶助教育”为目的,于1926年正式建立东方图书馆。

东方图书馆是一座钢筋混凝土五层大厦,占地约3亩半,藏书规模当时为全国之最。据闸北区地方志记载,图书馆藏书总数计51.8万册,图表照片5000多册,其中有各种善本书5万余册,不乏稀有的精品,如《永乐大典》25册、绍兴刻本《春秋左传正义》等,

还有各地地方志2.56万册,占全国地方志总数80%以上。东方图书馆每日下午和晚上向市民开放,1929年还采购新书数万册用于外借,年均进馆阅览人数为3万人。作家沈雁冰等许多著名人士都曾在此汲取文化养分。

日寇炮火吞噬馆藏

然而,这座东方文化宝库却毁于日寇的炮火下。

1932年1月29日上午10时

许,从能登号航空母舰起飞的几架日本轰炸机呼啸着飞过宝山路上空,向印刷抗日教科书的商务印书馆总馆投下6枚炸弹,一路之隔的东方图书馆被蔓延的大火殃及。

2月1日上午8时许,日本浪人又冲入馆内纵火。火舌在图书馆内肆意蔓延,一直燃烧到傍晚的熊熊火焰把这座中国规模最大的图书馆吞噬殆尽!馆藏中,仅有5000册寄存在金城银行保险库中的善本古书幸免于难。

家住宝山路的杨先生当时住在苏州河边的租界里,他回忆说:“当时火势很猛,天空中到处都飞扬着纸灰,连十里开外的租界里也飘落焦黄的《辞源》《廿四史》等书籍的残页,看到的人没有不心痛的。”

社会各界捐书捐款

东方图书馆被毁,直接经济损失达627.62万余元,更是我国文化史上一次浩劫。国民党中央委员孙科、孔祥熙、吴铁城,北平学术界人士胡适、蒋梦麟,以及在沪的英、美籍传教士百余人纷纷发表通电、宣言,谴责日军暴行。第十九路

军军长蔡廷锴极为愤慨,激励官兵奋勇杀敌,以雪国耻。

眼睁睁看着自己多年的心血葬于火海,张元济的心情极为沉痛。张人凤说,当时祖父每次谈及这个话题都会流泪,并多次向家人和朋友表示,他想利用商务印书馆的财力,尽量将散落民间的善本收集起来,没想到这些书籍却在一夜之间被焚毁。

侵华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曾得意洋洋地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把中国最重要的这个文化机关焚毁了,它永远不能恢复。”

但盐泽幸一一定不曾料到,中国人民是不会屈服的,中华文化是不会灭绝的。张人凤介绍,东方图书馆被毁后,社会各界都希望重建,商务印书馆专门拨款收集图书。张元济号召员工捐款,并带头捐了1万元。社会各界也纷纷捐书捐款。虽然东方图书馆最终未能复兴,但暂存在威海路静安别墅里的许多新募书籍与幸存的部分善本书籍一起,在建国后被悉数捐赠或出售给文化部,收藏于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

本报记者 孙云